春秋人文报

刊号：BNU-006
2020.05.20 总 第99期

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报头题字：刘乃和　指导老师：赵云慧　主管老师：胡小溪　社长：陈嘉琪　主编：王雨璇　副社长：王耀璞　副主编：郭妍 黄琳

口吟诗词，身着华服，不息的血脉，不灭的风骨……2 版
5G 仅仅是快吗？……3 版
客里尚须谈世事——南宋遗民“以词存史”考察……4 版
芝兰之风，温润其家……5 版
集句诗的前世今生——从“自挂东南枝”说开去……6 版
“九”字诗……7 版
白寿彝：学海探珠，誓不罢休……8 版

官方微博：北师大—春秋人文报
微信公众号：chunqiurenwenbao
工作邮箱：chunqiurenwen@163.com

本版责校：王雨璇　本版美编：一二　本报发行：陈嘉琪　邮箱：chunqiurenwen@163.com 欢迎投稿

口吟诗词 身着华服

不息的血脉 不灭的风骨

我们所立足的华夏文化，经风雨吹打仍熠熠生华。尊重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也成为青年一代自觉加诸己身的时代担当。其实在北师大校园里，就有许多传统文化类社团。在众多传统文化社团中，我们有幸采访到南山诗社现任社长李萃宸和华章汉服社现任社长郝李惠哲，希望通过她们对各自社团的回顾和展望，展现我们对传统文化切实的渲染与触碰。

印象中，李萃宸总是着一身旗袍，温婉端庄，又带一丝英气，正与南山诗社的意蕴相符。自 2007 年建立以来，从无人知晓到小有名气、蓬勃发展，南山诗社走过了将近 13 个春秋。透过她的文字回顾来路，那份兴奋与激动让人感同身受。关于社团建立的故事，她如数家珍。一开始社团的建立完全基于“无预谋”的激情，老师们的期盼和师兄姐的勇敢构成了南山的雏形，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老师、方红珊老师、周云磊老师的支持和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孙永忠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一代又一代南山儿不断努力，使得南山逐渐变成如今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人员方面，出现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情。“在前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个名录整理，目前南山有名姓、可以查到联系方式的社员共 483 人，其中最早的 05 级只有 3 人（包括南山第一任的社长王蒙师兄）。而十多年过去，自 14、15 级开始，已经基本可以稳定到每年级约有四五十人加入南山诗社，社员来源也从文学院本科生发展到师大各学院本硕学生，甚至还有外校（如北邮）的诗词吟唱爱好者到访咨询。如今最早的社员早已踏入自己的工作岗位，甚至有些还留在了师大，成为我们的老师。孙永忠教授口中‘南二代’也已经诞生，这些从小以古典诗词为摇篮曲的孩子也在慢慢长大……”一代又一代衣钵传承，师兄师姐递给后代，轻轻拍拍他们的手，慢慢道：“保护好它。”一曲《蓼莪》，从聆听者到台上的演唱者，无不蕴含着满满的仪式感。岁月悠悠，让人热泪盈眶……

开学典礼《蓼莪》

回望来路，看着身后那一个个脚印，华章汉服社现任社长郝李惠哲也是感慨良多。她的声音温柔甜美，却又很坚毅：“我们社成立于 2011 年 5 月，汉服复兴刚刚开始，并不普及，由师兄师姐带领，慢慢摸索，一直到今天。我 2017 年入学时加入社团，当时社团已发展较为完善，有固定的组别和活动，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

华章汉服社19年中秋圆明园外拍场景

视线从背后的荆棘与暖光移到身前，谈到社团近期的发展设想，两位社长均表示，社团将在现有的明确道路上走下去。李萃宸说：“作为社团，依然是要为同学们服务，作为兴趣社团我们需要满足社员及校内同学需要。更希望能培养诗词创作、谱曲、演奏等多种能力兼备或者各有所爱、各有所长的社员。另外，也希望能在团建上有新的发展和创新……”华章汉服社也如是：“我们会按照社团目前的体系发展，在大的框架下进行小的创新。例如，我们已经举办了六届的年度专场表演，今年会以元稹和白居易为主人公，讲述他们的一些故事；各兴趣组的活动内容和形式都会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拓展；还会举办一些特色活动，例如传统文化类讲座和传统节日相关活动也会继续组织，还是希望能带给同学们更为丰富多彩的活动体验吧。”两个社团在建立之初就已明确自身的性质与立足点，今后便是深耕与适当的创新，稳定持续。

华章汉服社流羽组礼射

摸索着，前进着，盼望着。南山诗社和华章汉服社仍有一些一直想做却未做的事情。李萃宸言：“在诗词吟唱专业层面，我们希望能和更多专业人士进行交流，取长补短，展现更好的专场演出。在宣传层面，我们也希望能通过更多渠道让社会对南山有更多了解。我们目前除了南山本有的一些社会活动，也主张诗社成员进行国学支教，但其他方式亟待探索。在自身建设层面，我们希望加强团建，提升社团凝聚力。并且我们希望能将南山十三年来的发展在今年做一个较为详细的资料整理，来完成南山‘家谱’信息簿这一浩大的工程，能更好地实现兴趣交流。”华章汉服社在宣传方面也在摸索着，不仅有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甚至还入驻了 bilibili。郝李惠哲指出汉服社的这些宣传平台在运营和管理方面还有不足之处。外在宣传方面亟待加强，但社员们不会忘了社团的中心——汉服本身。目前社团的工作重心仍放在为大家提供一些汉服及与汉服相关的活动，要先立好根，避免本末倒置。再回首，仍不忘初心——在这一点上，两个社团是一样的。

南山儿在《诗意中国》节目

南山诗社和华章汉服社都是传统文化类社团，日常组织的社团活动不仅影响着社团成员及校园文化，更为传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做着贡献。“作为一个社团组织，南山诗社一直都发挥着它的社团功能和社会功能。”李萃宸的言语中透出一点自豪。“在校内，我们参加校园迎新和校内各社团的交流互动，像燕归来传统文化节呀、社团嘉年华等。同时，我们也与韶兮国乐社，松风琴社等社团合作推出了一系列提高同学们传统文化素养的精品活动。校外，南山诗社与东篱、采菊、悠然等诗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与秦风诗社、昆仑诗社、学步诗社等各大高校诗社交流互动。多年来，我们已经在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了短期教学及展演，并进行了诗词吟唱剧教学的课题研究。对外交流上，诗社每年与来自全国各地、海峡两岸的小伙伴们共同交流古韵新妍，积极广泛参与高校活动、社会活动、支教活动。我们不仅想成为校内传统文化的使者，更想让古典诗词之美浸润每一个人的心灵。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和我们一起将诗词吟唱的种子不断播撒，吟唱起优美的旋律。”华章汉服社同样在大活动与小细节上传承着、散发着中华韵味，“服饰是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例如我们常说的右衽——为什么是右衽呢？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我们以左为阳、右为阴，所以左边的衣襟要压在右边的衣襟上，从正面看衣领是向右的，所以叫右衽。在平常的一些活动中，我们也会注重汉服中体现出的传统审美，从中追寻文化要素，体会传统文化的滋养。这样的互动对社员及其他同学都有熏陶，它可以让更多的人认同传统审美，愿意深入了解传统服饰，探求先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道路漫长，“旋律追寻古人章句中的灿烂真意”是南山诗社的宏愿；“振兴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复兴华夏衣冠”是华章汉服社的信念。南山儿“会朝着这个目标，“不断‘感发性情、吟咏精神’。南山的发展没有预设的定局，它发展过程中实现的每个目标都是我们南山儿想要见到的样子！”华章汉服社希望能“以汉服为中心，带大家更多去了解、研习汉民族传统服饰与服饰文化。丰富旧有活动，增加与传统节日、相关人物的联系。不能忘记我们的中心和我们立足的根本。”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人家，现在依旧可以复制。可若深潜在炎黄子孙血液中的气息断了，便无法挽回。无论是南山诗社还是华章汉服社，都在尽己之力，延续着这血脉。口吟诗词，身着华服，我们仰起头。迎清风，看月落日出，观车水马龙，感清冽的甘甜，品中华文化之无穷回味。

撰稿 / 本报记者 潘景怡
（图片均来源于受访者）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社名是社团的灵魂。

“凤鸣九韶，归兮八音”，韶兮国乐社承载着创建者的心意诞生了。“韶”，是源起先秦的祭祀之乐，场面宏大却又温厚端凝。《说文解字》言韶为：“虞舜樂也”，亦足以证明“韶”在中国古代音乐中的地位。一个“韶”字，既有丰富的历史沉淀和内涵，又包蕴了社团热爱并传承民族器乐的定位。

从京师笛箫社到韶兮国乐社，经历了成员的变动、社团定位的调整乃至发展宗旨的转换。如今的韶兮国乐社，已经走过了当年转变时期的踌躇，有了一个广大而又明确的目标。“我们把受众初步分为三类。”当谈及未来的发展规划时，现任国乐社副社长的王文娟如此解释，“我们是一个兴趣类的社团，只要怀揣着兴趣的，无论水平高低都可以来。对于已经有多年乐器基础的老玩家，他们能够享受在大家庭中与朋友们共同‘玩音乐’的经历，并在理论知识上努力向专业朋友看齐；对于已有兴趣的初学者们，他们能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坚定自己的兴趣与信心，并将兴趣变为习惯；而对于广泛的路人受众，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广泛宣传，让他们对民族乐器产生更多的了解，对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这一些音乐瑰宝能有更多的认识。”

事实也正是如此。每年春季学期在学活举办的音乐会，向全校的师生展现了中国传统乐器的魅力。从红楼梦到四季更迭，似乎所有美好的事物的都能成为他们音乐会的主题。而各色主题也最终都在吹拉弹唱中幻化成观众与演奏者们记忆的亮色。除了定期的音乐会之外，日常的讲座也成为国乐社宣传传统民乐的绝好机会。“上个学期我们就邀请到了青年竹笛演奏家马云鹤老师，为大家举办了一场笛箫相关的讲座，当时还吸引了一些校外同学来听。”王文娟向我谈起这段记忆时，话语中仍有隐隐的骄傲。

国乐社“我和我的祖国”国庆快闪

“兴趣”二字是他们立身的前提，也蕴含着他们的热忱与担当。但众所周知，社团在选择兴趣性的同时，也就放弃了一些强制性。兴趣类的社团常常需要面临社员归属感的问题。不过韶兮国乐社现任社长刘尧佳对此并不忧虑，“社员与社员之间因为水平不同而产生分层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并不应该去强求各层之间的沟通。要知道我们就是一个兴趣类的社团，这个定位是根本准则。”她顿了顿，接着说道，“在这个大前提下，社员的流失也是正常的现象，我们也并不为此感到失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提供更加优质广阔的平台，做好传播者的工作。当然，作为社团一方，我们肯定也希望社团的活动能够吸引更多人参加，但这也是需要双方的努力的。有的同学可能学一学期就觉得可以了，就不再学了，他们的意义也不应该否定。”

传播传统的民乐，是国乐社最初的使命。但当分层出现，选择大众化还是专业化就成为了一个方向性问题。对此，王文娟表示，在具体实施层面，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最根本的方向是一致的：向大众化发展。而这句话也是对另一句话的回应：我们是兴趣类的社团。这样的标准根植于历代国乐社决策者的想法中，在交谈中反复被提及。刘尧佳更进一步的指出：“这个‘大众化’指的应该是：第一，我们社团面向的群体是所有同学，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像民乐团那样去筛查大家的乐器演奏水平和乐理水平，你本身会乐器，或者你只是喜欢这个东西，又或者你没接触过它但是对民乐有点好奇，我们都是欢迎的；第二，在社团内，其实没有基础的同学或者基础比较弱的同学是占绝大多数的，而有一定基础的同学是少数。我们并不是所谓的不求上进，而是希望能够更多地根植于基础，在缺乏基础的同学中传播、教授相关的乐理知识。”

国乐社“故语新歌”音乐会

有幸在 b 站看过韶兮国乐社的投稿视频。视频中，是年轻的面孔演奏着千年的乐器，看起来却富有灵动的神韵。在这场奔赴音乐殿堂的路上，不仅有“韶兮”奋进，亦有“以雅”同行。

“以雅”二字，取自《诗经·小雅·鼓钟》。其末章云：“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龠不僭”。“以雅”就是行雅之义，追求传习昆曲的雅音正声。而这个归属于兴趣类社团的名称里，却有着“研习”二字。

以雅昆曲研习社有别于大

昆曲社活动剪影

部分纯粹的学校社团，更像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形成的、与社会联系紧密的社团。虽说每年的招新都是在学校展开，但是常驻的社员大部分是那些已经步入社会、有着工作的昆曲爱好者们。

昆曲难以上手的特点和社团独特的社员组成状况既是昆曲社的独特之处，也成为其发展的桎梏。“昆曲本身就是系统化的东西，一个大学的学生是很难起到教导同伴学习的作用的，所以我们主要还是由专业的老师带领着学习，比如我们每周六的拍曲活动，就是老师教我们一句一句学。内容其实比较枯燥，而且学术性比较强，有时候晦涩难懂；再比如说不定期的讲座，事实上如果前期不打好基础，仅是凭着兴趣去听，也是很难听出效果的。真正的曲会，也要求与会者能做到基本的了解。这些都是昆曲本身性质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因素，你不可以学一节落一节。”现任以雅昆曲研习社社长的张心玉在接受采访时认真地纠正，“总而言之，光有兴趣其实是不够的，我们曲社是严肃的学术性清曲社团，能够留下来得人肯定要兴趣特别大，并且责任心特别强。”

从清曲拍曲、出游雅集到同期曲会，昆曲社的活动听起来都清雅无比。然而风雅的背后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苦。“招新的时候人能坐满一屋子，但是可能一学年过完，只能留下当社委的几个人。”张心玉笑着说道，“能够进来的肯定都是热爱昆曲的，但是随着学业压力的增大、昆曲内容难度的增加，退出也是很自然的事。如果他这一个学年每次的活动都参加，也能够收获到足够多的知识，推广昆曲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当谈及成员流动性大所造成的弊端时，张心玉不免有些担心，却也不强求：“还是希望我们这一届快点成长起来呀。昆曲发展到现在确实是小众的文化了，或许说传统的文化到现在都遭遇了瓶颈期。但是对于社员的选择

（下接第三版）

昆曲社演出现场花卉

（上接第二版）

我还是持着一个随缘的态度。在我心里昆曲是能够带给人快乐和美的享受的东西，在我们这里，社员的加入和离开也都是非常自由的，大家是因为兴趣聚集在一起的，都是平等的。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曲友们选择我们，而不是我们去选择他们。”

或许这也是以雅昆曲研习社和传统校园社团的一个不同点。在这里，更多的问题是精通者的地理变动，而非新鲜血液的缺乏。确实，新的热爱者和传承者正在不断成长。即使是在传统式微的今天，仍有一大批年轻人热爱传统的文化。19 年昆曲社的招新情况相较于 18 年便好上许多。而当谈及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否要将重心转移到校园中而减少校外的成员时，张心玉也给出了明确的答复：不会。“我们需要的不仅是速度和人数，也需要质量上的精益求精。传播昆曲的文化知识依托相关的知识讲座便能达到最基本的目的，能够满足大众对于昆曲知识的需求，但是作为昆曲的研习社，更多的是希望培养出具有充分素养的昆曲爱好者。”

年轻的我们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或许都曾遇到重重困境，但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韶兮国乐社和以雅昆曲研习社只是其中的集体代表而已。咿咿呀呀的腔调和摇晃的蒲扇让我们得以接触这些传统文化，曾经存在于先辈卷曲的烟卷之间。有朝一日偶遇某种曲调，记忆刹那唤醒，自此以后，个人的爱好，社团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在传统文化类社团仍怀着初心奋斗的时候，真正的主力军也不再是叹息的大师，而是选择了付出的青年一代——即使他们缺乏熟练的技巧，即使仍有着不能确定的发展方向。

年轻的血液正在苏醒。

撰稿 / 本报记者 王心怡
（图片均来源于受访者）

5G 仅仅是“快”吗？

基站建设

公交站台的广告牌换上了 5G 手机的广告，这无疑是一个讯号——存在于人们口中的“5G”，已经变成现实。2019 年 11 月 1 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正式上线 5G 商用套餐，5G 进入了正式商用阶段。而在 2020 年，预计中国将建设超过 50 万个 5G 基站，这将进一步加速全球 5G 的部署（王喜瑜：《5G：期待中发展，质疑中生长》）。预计到 2035 年，5G 将在全球范围内带动 3.6 万亿美元直接经济产出（桑建：《5G 时代来临，民族教育准备好了吗？》）。5G 无疑是引领创新、激发新型信息消费的新动力，是促进产业升级、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引擎。

然而普罗大众还缺乏对 5G 技术本身及其发展现状的客观认识和整体把握。专家、学者、相关业务人员乃至一些大学生群体通过许多渠道向观众传递 5G 信息技术知识，他们传达出一个信息：“5G 不仅仅是快，其背后是全新的信息力量。”

5G 的面具下到底是什么？

我们首先需要摆脱自身对 5G 的有限认识以及回音室效应的影响，像认识一个新朋友一样面对它。

5G，即“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意为“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其性能目标是实现高数据速率、减少延迟、节省能源、降低成本、提高系统容量和实现大规模设备连接。

5G 具有三大核心技术使其能够真正参与人们的生活场景，分别是：毫米波技术，大规模多输入多输出技术和波束成形技术。

其中毫米波技术最为关键。当前用于连接网络的频谱范围是三千赫兹到六千兆赫兹，随着接入的互联网设备数目的增长，这无法为每个设备提供充足的带宽。而毫米波技术的应用则可以有效拓展可用频谱范围，保证接入网络的海量设备可以正常运行。

接下来，在基站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大规模多输入多输出技术让更多人设备得以接入——每平方公里内单个基站可连接设备超过一百万台。从而在城市枢纽、体育馆等大型公众场合提供高质量连接。

波束成形技术可以被视作大规模多输入多输出技术的补充。在现有的广播式信息传输技术下，过于密集的天线会导致信号波相互干扰，甚至造成数据毁坏、出错。而波束成形技术则可以通过跟踪信号的传输路径，使信号只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发送，且仅仅发往目标设备。此外，波束成形技术还可以让信号通过障碍物的接力反射到达目的地，有效的减少了信息传输中的损耗。

5G 的三大核心技术

5G 仅仅是“快”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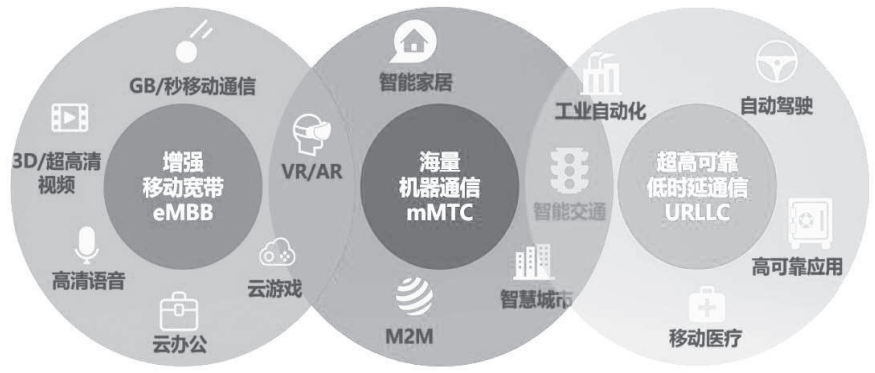
5G 有 EMMB、URLLC 和 MMTC 三大应用场景。由此观之，其优势不仅仅是为人所熟知的一句“网速快，低延迟”。简单来说，这三大应用场景可以分别理解为消费性互联网、物联网和海量物联网通信。

与我们日常生活结合最紧密的是互联网，但需要纠正的一点是：消费性互联网并不是互联网的全部，还有产业互联网和政企互联网，我们的农业、工业、教育等很多行业也一直存在着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需求。此外，5G 最有突破意义的发展方向是物联网：从局部看，它能够让 4G 时代的很多技术发挥出全部实力；从整体看，5G 针对的是更为广泛的基础设施升级问题。

5G 技术看上去只是提高宽带，但实际上却打破了长久的技术僵局。4G 为主的低带宽时代，许多应用无法实现。比如，从技术上讲，4K 视频并不算超高清视频。虽然 4k 视频对我们个人以中小型屏幕为载体的娱乐来说好像已经足够，但是随着近距离激光投影、超大屏幕等技术的不断成熟，4K 视频的清晰度就不够了。比如在工业领域高精尖制造的视觉检测等应用，4K 像素的视频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需求。而 8K 甚至更加高清晰度的视频，就需要在 5G 的超大带宽特性支持下传输。又比如，以前的无线通信技术童超会导致数据传输延时超过 30 毫秒。这一数字看似很小，但如果高速公路上的无人驾驶车辆在接受云端指令时存在这 30 毫秒的误差，其行径路线就会出现数米的偏移，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悲剧。而 5G 在时延方面可以降低到 10 毫秒以内，这种低时延特性对于实时性要求极高的远程手术、远程控制等应用意义非常重大。

面对 5G，我们还需要什么准备？

首先，5G 从研发到运营还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目前能使用的 5G 采用的是非独立网组，这意味着用来传输 5G 信号的基础设备是由 4G 的原有设备改造而成。这样的设备能够兼容 4G 和 5G，但却大大限制了 5G 功能的发挥，而能够发挥其全部功能的独立网组又需要在各地区重新建设与 5G 配套的通讯设施，这无疑是一项耗时、耗资巨大的工程。



5G 的三大应用场景

基站建设

同时，被人们强调的“5G 网速”背后是高昂的资费，在这一新技术还未具有社会普遍性时，其相关的资费很容易呈现虚高态势，这一点可以参看 4G 刚上市和现今的资费价格对比。也就是说，真正的万物互联时代距离我们并不是近在咫尺，未能释放全部能量的 5G 颇有种鸡肋之感——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对此现状，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脱离媒体和各大运营公司的炒作，脱离 5G 的“测速”风潮，冷静对待 5G。

而且新科技的运用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往往是未知的。在 4G 网络还未上市运行前，人们对于 4G 的猜测也大多局限于现有网速提高，但 4G 普及后催生的一系列新产业（如：直播、微信支付、线上运营平台）却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与此同时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出乎人们的意料。而 5G 又会催生什么样的产业链、触发怎样的未知？

面对 5G 我们不可盲目乐观，比如个人信息泄露在 4G 网络时代就是一个难以忽视的问题，而在 5G 生活中，这一问题必然会被扩大。举个例子，在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汽车自然包括其中，为了增强汽车运行的安全性和效率，车辆内部的故障检测系统会与该品牌的售卖商家进行互联。当车辆出现故障，故障信息会上传至商家网络，商家会对消费者进行回馈，告知其车辆的故障原因和最近维修处的地点。这代表商家会掌握大量消费者的日常行车路线，如果不能有效对这些信息进行保护，那么从中可以轻松得知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和日常生活地点——而消费者无法防止这些信息被收集，其造成的影响也将远远超过诈骗电话和骚扰短信。而 5G 运行中产生的大量数据必然需要更高级、更智能的处理器完成，这就与人与科技间无法绕开的“人工智能”话题挂钩，人工智能的伦理地位、人工智能对人类可能产生的威胁……这些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举足轻重的问题，需要用审慎的眼光对待。

华为最新 5G 手机 mate30

5G 不仅是科技问题，还是思维问题

科技的每一次革新后都蕴藏着极大的可能性，除了在使用层面上推动其他相关技术的成熟发展外，5G 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思考。

事实上人们总是难以理解、接受新生的事物，在科学技术领域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法拉第于 1831 年发明圆盘式发电机，而 20 年后的首届世界博览会上，琳琅满目的蒸汽机依然是水晶宫的宠儿。新能源已经诞生，但大多数人依旧认为今后世界的主旋律是齿轮的铿锵和皮带的节奏。当 4G 刚刚“出道”时，人们也说“我感觉 3G 已经足够快了。”“4G 除了快还有什么用，费用还更贵。”但是放在今天，还有人会认为 3G 和 4G 没有什么差别吗？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短视的，在思维上也有着惯性。2019 年 10 月 13 日，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于日本埼玉大学出席“科幻与科学”主题研讨会。在被问到“科幻作家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社会价值”这个问题时，刘慈欣提到目前我们科技创新的一大障碍——“直线思维”。直线思维，即我们长久以来的所习惯的单向思考模式，它使得我们“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思维限定在特定的发展方向上，这也是为什么蒸汽时代的人们不理解电气的伟大。刘慈欣继续指出，我们的发展模式早已经变化为“曲线思维”。与直线不同，曲线的方向是时时刻刻变化着的，它前进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如果我们不能转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前进的脚步必定会被放缓，甚至停滞。

我们期待科技的进步带来思想的提高，但反过来，科学的攀升更依赖思维的升级。刘慈欣在会上无奈地说，单靠科普作家，是难以完全承担科学思维的普及的，一个小群体目前的思维力量还太单薄。只依赖自上而下的普及，科学思维难以成为共识；而不能改变的寸目之人，势必成为科学发展的阻碍。当我们“冷漠”地为 5G 的到来欢呼时，并非是科技带着我们腾飞，而是科技将我们抛下。

撰稿 / 本报记者 秦志桐
王一玮
（图片均来自于互联网）

從庶民飲食到紅遍九州

——辣椒在中國的選擇性傳播

辣椒无疑是当今中华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一味食材。然而，它却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辣椒原产于美洲中南部，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它与玉米、番薯、番茄等其他美洲物产，逐步经海路传入中国。浙江及其附近沿海地区是辣椒最早传入的地区。那么，在进入中国之后的数百年间，辣椒是如何传播的，又何以获得红遍九州的成就呢？

辣椒初入中国时，并没有直接地登上餐桌，而是成为了江浙富庶人家花园中的观赏花卉。明万历十九年（1591），杭州人高濂撰写的《遵生八笺》刊印，其中记载的106种观赏植物中就包含辣椒："番椒丛生，白花，子俨禿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这是迄今所知与辣椒有关的最早史料。此外，辣椒还曾出现在《牡丹亭》的游园惊梦里，在昆曲中被浅吟低唱。

辣椒被当作观赏花卉

随后，辣椒溯江而上，在清朝乾嘉时期迅速占领了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居民的食谱，并兼及江西、湖北多地，从而造就了中国最典型的饮食重辣区。这种饮食习惯的分布格局最迟在道光年间已然形成，吴其濬（1789—1847）《植物名实图考》中即称："辣椒处处有之，江西、湖南、黔、蜀种以为蔬。"其中的湖南、贵州、四川三地至今仍是重辣区的核心。辣椒为何在这些地区备受追捧呢？

以最先食辣的贵州为例。首先，中国农民的饮食习惯"多主食、少副食、重调味"，而调味又分咸、酸、辣三味。贵州食盐资源匮乏，加之地形崎岖、运输成本较高，因此食盐稀缺昂贵，长期食酸以代盐。辣椒传入之后，自然很快成为居民更佳的选择，乾隆《思州府志》即载"土苗用（海椒）以代盐"。其次，贵州"八山一水一分田"，土地稀少贫瘠，食物匮乏。辣椒以其较强的适应能力、丰富的营养、低廉的价格、便捷的加工贮藏方式，成为当地居民的首选。道光《遵义府志》就称辣椒是"园蔬要品，每味不离，盐酒渍之，可食终岁"。贵州先民正是靠着辣椒对味蕾的强烈刺激，将粗糙的饭菜"哄"入腹中。同时，贵州日照不足、气候湿冷，桑、麻、棉均不宜种植，布料稀少难以抵御寒湿。《名医别录》有载，辛香调料能"除六府寒冷"。而辣椒"其味最辣"（陈淏子《花镜》），能有效驱寒祛湿，因而备受当地居民喜爱，民谚"糠菜半年粮，辣椒当衣裳"流传至今。

川菜中麻辣口味的代表：水煮肉片

此外，食辣群体的迁移也对嗜辣区的形成影响颇深。康熙年间大规模"湖广填四川"，使得大量嗜辣人群进入四川，也使"好饴蜜"的四川饮食传统，迅速被嗜辣的新传统取代。同时，四川盛产花椒。花椒震颤舌尖的麻味与辣椒酣畅淋漓的辣味相结合，形成了如今川菜独有的麻辣味道。

重庆九宫格火锅

辣椒在长江中上游成为宠儿，却始终没能在最先落脚的江浙地带占据餐桌一席之地。直至今日，出现在江浙饭菜里的辣椒也只是用作配色和点缀。从物质条件上看，江浙地区物产丰富，尤其是水产多而鲜美。富庶的江浙人在丰饶的土地上生活，有条件也有能力在食物的味道上讲究。他们更愿意品尝百菜百味，而不愿让一辣遮百味。从文化心理上看，江浙自唐宋以来渐成人文荟萃之地，人们奉行"大味必淡"的饮食观念，追求食物的本真味道。李渔《闲情偶寄》云："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就充分表达了这种追求"味无味"的饮食哲学。

由此观之，食用辣椒最初并非味蕾的选择，而是贫民的无奈。掌握着饮食文化话语权的社会上层则认为辣椒口感突兀，不符合口味调和的原则，与其崇尚淡味的饮食哲学格格不入。于是辣味就成了"庶民菜"的代表，长期被贵族和世家排斥在外。譬如曾国藩嗜辣，就愧对人言。

虽然被上流社会排斥，但辣椒在社会中下阶层中却逐渐普及。近代开埠之后，城市工商业得到发展，纤夫等体力劳动者需要补充能量却又消费不起精肉，只能吃动物内脏或是不太新鲜的肉类，而辣椒浓烈的味道恰好能够祛除食材的腥味。于是，毛血旺、红油火锅等菜式应运而生，成为体力劳动者的不二选择。然而，尽管有了这些辛辣的"江湖菜"，不同阶级饮食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却还是使辣椒未能突破庶民的藩篱。

贵州省农民晒辣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嗜辣人群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断上升，辣椒不再是"乡下味道"，反而成为了工业化城市中的标志性食材。大部分人早已不为生计所迫，但偏好辣味积久成习，已很难更改。与此同时，辣椒又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文化隐喻，它承载着人们对直爽性格的赞赏，寄托着人民对红火生活的向往，因而也就愈发成为了中国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风味。

的确，中国古代不同阶层饮食文化的分野有其背景，也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嬗变。在很长时期内，江浙文人崇尚"味无味"之哲学，口味清淡，回归本真；官宦世家奉行中庸之道，口味平和，醇厚中正。如今，两种口味尚在，但代表两个阶层的饮食仪轨却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而原本被视为庶民饮食的辣味则逐步登堂入室、红遍九州，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代表。这或许也是时代的绝佳隐喻——阶层跃迁流动，价值激荡重组。但饮食代表的美好生活一直都在，辣椒也从未远离。

撰稿／本报记者 许宸睿

客里尚須談世事

——南宋遺民"以詞存史"考察

"所谓诗，所谓文，实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系焉。"这是南宋末年郑思肖写在《心史》序言里的句子。史家意识与遗民情怀使郑思肖创作了《心史》这部著作。它是郑思肖经历亡国之痛的心灵史，反映了特殊时代遗民的心境和他们对时代变化的认识。而在南宋遗民文人的创作实践中，留存记忆的努力却不惟《心史》，宋代极为流行的文学体裁——词，也当为我们关注。

在南宋遗民词作中，众多文人选取了存史纪史的叙事性主题。词乃是一种文学体裁，注重情节性。受此限制，词作中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录往往是片断式的。以宋廷覆亡的历程为例，恭帝被掳，临安落入蒙古之手，重蹈靖康旧事，宫嫔后妃多被掳往北方。宫人王清惠在北押路上，留有血泪篇章《满江红》，其中有这样的词句："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鼙鼓"本指骑兵用的小鼓，自唐白居易"渔阳鼙鼓动地来"始，便被用为外族侵略之典。亡国之际，词人们对于战后物是人非的社会现状，亦写实纪录下来。比如"无灯可看。雨水从教正月半。探茧推盘，探得千秋字字看。铜驼故老，说著宣和似天宝。五百年前、曾向杭州看上元。"（刘辰翁《减字木兰花》）本来就"无灯可看"，加之天公不作美，阴雨连绵，令人好不气恼。流传千年的元宵节俗曾经给汉民族留下无尽的欢乐，但这一切随着元军的入侵而变得消散零落，再也没有往昔的繁荣和盛况。再比如"浮屠换，朝阳殿，僧磬改，景阳钟"（罗志仁《金人捧露盘 · 丙午钱塘》），载昔日朝阳殿变成了佛寺，当年的景阳钟换成了僧侣敲击的石磬。元僧仗势横行强占房屋的背后，是元朝崇信佛教的政策导向。南宋由兴而衰，由枯而荣的过程皆被词人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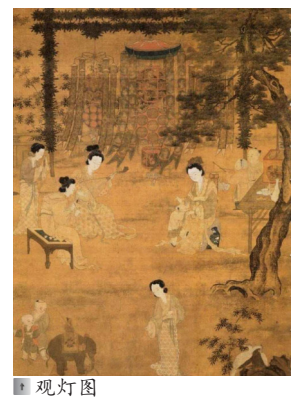
《登西台恸哭记》卷端

"史"的意义，除了叙事纪实之外，"春秋笔法"也是一大特色。"燕歌赵舞动南人。遗民植杖唐巾起，闲伴儿童看立春"（刘辰翁《鹧鸪天》）——为燕歌赵舞所吸引的是"南人"，陪伴着不谙世事的儿童一起看这迎春盛典的是那头戴唐巾垂垂老矣的"遗民"。作者在此虽未直言遗民所受的政治压迫，但"南人"与"遗民"二词的出现却已揭示出当时客观的现实及词人内心的巨大痛楚，同时也道出词人对于气节与操守的坚持。此外，刘辰翁《须溪词》中多处刻意以"番腔"、"番笠"、"胡儿"等带有浓重的华夷之辨色彩的词语来指代异族统治及其统治之下社会风气的变化。"番"、"胡"正是当时南宋遗民对蒙元异族蔑视与排斥的时代心理的反映。以一字寓褒贬，本是史家纪史的笔法，其在词中的运用，既深化了词作的审美内涵，又增强了词作"以词存史"的叙事功能。

检诸史料，我们发现在词的发展历程上，"以文为词"之风肇始于苏辛，创作自觉也由此诞生。但以现世之事直接入词，在前代却不多见。那么，这种创作自觉来自于何处？

国亡史存，是古代文人的共识。面对故国沦丧、三宫被掳、厓山覆灭、杨僧发陵，身为南宋遗民的词人意识到存国史的责任。郑思肖曾言："天下治，史在朝廷；天下乱，史寄匹夫。"宋元鼎革，在时人看来并非简单的易代，而是文化内涵与民族心理的变迁。若将国史放由"异族"来修，必会有不实之处，尤其是宋亡元兴这段历史。以何种形式留存这段史实就成为了文人需要思考的问题。元初，文网方张，周颐《蕙风词话》载："当元世祖盛棱震叠，文字之狱，在所不免"。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堂而皇之的记述几成绝迹，为文为词似乎是唯一能够留存下"印记"的方式。

宋元易代之前，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战乱频仍、动乱相继的时期。然而前代之世虽常留有思念故国的作品，却没有诞生过诸如南宋遗民词人这样的群体。南宋遗民存史纪史的创作自觉，究其原因，是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与时代现实的交织。南宋史浩曾向孝宗说，"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是仁宗以来"祖宗之家法"。在社会共同意识方面，士大夫群体成为重要的政治主体，范仲淹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呼声获得了普遍而热烈的回响。从南宋儒学的发展来看，仅以最具代表性的理学家朱熹和陆九渊两人为例，他们虽然毫无疑问在"内圣"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们生前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外王"的政治追求。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与实际的政治力量是可以想见的。然而，宋元易代之际，元蒙统治者大量屠戮南宋文士。残酷的社会现实，使文人从此丧失了实现"致君尧舜，使风俗淳"之政治理想的空间。加之元蒙贵族主宰中原大地后，对文士有着无法消除的心理隔阂，在其近百年的统治中约80年不开科举。时局的改变，导致了文士们生活道路的变化。由此观之，南宋遗民词人在词中隐约寄寓思念故国思念故君之心，是出于完成其原本人生理想的情感。


观灯图

类似的人生经历、相近的生活遭际，使宋末元初南宋遗民词人的作品在明末清初大批身历亡国之痛而退居林下或流落江湖的文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产生了"异代同悲"之感。而南宋遗民词人"以词存史"的努力，在明末清初文人的创作实践中又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继承。如张岱，经历天地巨变，满清入主，社稷颠覆，民生涂炭，家道破败，他坦言"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在极其艰难的物质条件和十分痛苦矛盾的精神状态下，张岱前后历时二十七年写就《石匮书》这部纪传体明史之煌煌巨著。此后，又续撰成《后集》，以纪传体补记明崇祯及南明朝史事。更有《西湖梦寻》等笔记，追记往日西湖之胜，以寄亡明遗老故国哀思。诸如此类，均可视作是他留存记忆的努力。

山河破碎，身世浮萍，经此世变，如何于天地寰宇间恰如其分地活着？这是遗民思考的问题。当感叹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时候，我们能否感受到当时写下这些字句之人的复杂心绪？身被陵谷变迁之痛，历经民族心理巨变，南宋遗民发而为词，并将史家意识与遗民情怀灌注在其中，不可谓不是保留宗国覆亡事迹和文化血脉的努力。于隐微处见天地，于静谧处起波澜——这正是作为后人的我们，对古人的"温情与敬意"之所在。

西湖寻梦

撰稿／本报记者 宋紫怡
（图片均来自互联网）

芝兰之风，温润其家

一言一行一家人，一门一户一家风。“家庭是传输和接收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第一个实践场所，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文化学者刘金祥如是说。生于斯，长于斯，家庭是每一株树苗扎根之土，对人的一生有着最为原始和深远的影响。

从古至今，家庭教育的传统从未断绝，妇孺皆知三苏，南北亦明杨家将的故事。不难发现，书香门第大多文人辈出，忠烈之家大多名将满门。其外是家族传统的延续，其里则是家风的滋养与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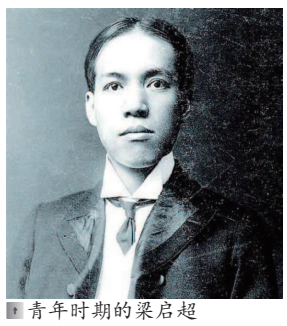
先辈 · 模范

父母，教育之初始。其一言一行皆是种子，播撒在子女心田，多年培育，最后是芬芳馥郁的玫瑰，还是毒性深藏的罂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初心田中里播种下的种子。

鲁迅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一文中写道：“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健全”不仅是四肢健全，更是心智、思想的健全；“尽力”并非只是言语教育，亦是行为影响；“完全”不只要放开风筝线，还应要摇响引路铃。

梁启超先生曾说，“我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人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姐姐弟兄的模范”。以后人眼光看来，他已不愧于成为子女的模范，他的家庭亦是“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在新思潮的冲击下，父权思想遭受抨击和唾弃。如何扮演父亲的角色，事关家庭伦理，也是时代重要命题。在 14 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中，梁启超接触到西方教育理念，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风格。在对孩子的教育中，他做到了“知育、情育、意育”，以道理引路，不做经验的捆绑者；以情理动人，不做专制的独裁者；以实践垂范，不做“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青年时期的梁启超

“求学问不是求文凭”“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去”，是他对子女求学的期盼；以“趣味主义”为引，过“如旭日升天，如新荷出水”般可爱的生活，是他对子女情感的关怀；不沉醉生活的“温柔乡”，走出生命的安适圈，是他对子女生活的告诫。家国放心中，责任放肩头，不失对生活的热情和探索，不弃生命的乐观和坚守，做自己生命的掌舵人，临风浪而不惧，遇雷暴而不畏，是他一生的信念，亦是他在教导子女的过程中贯彻的理念。

家书，纸短情长；挚言，言深意重。梁启超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成功教育子女的同时，也实现对家风的传承。耕读世家，不忘勤勉；生于华夏，不忘忧国；立于社会，不忘责任……这些不止是梁启超对其子女的期盼，更是先辈对后辈的期盼，是家族的绵延、家风的传承。

后辈 · 继承

家风的传承不仅需要祖辈做模范，亦需要后辈自觉践行。

2002 年 12 月，于广东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随后，疫情来势汹汹，一时席卷全国。在这场战役中，一句“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的豪言凝成晶石，闪耀于历史长河中。说出如此豪言的“战士”，正是钟南山。

在从医路上，钟南山深受父亲的影响。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是一名著名的儿科专家，于 1930 年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父亲在医学上的成就对钟南山而言，是榜样，亦是激励。钟南山曾在懈怠之时被父亲一语点醒。

35 岁前，钟南山在医学道路上的成就远不如今日耀眼；35 岁时，父亲的一句“35 岁了，真可怕”宛若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35 岁后，钟南山重拾对医学事业的热情，在医学事业上做出了更多贡献。同处于 35 岁的时间节点时，钟南山的医学成就以及治学态度是不及钟世藩的。父亲的一句感慨如醍醐灌顶，点醒了日渐满足于当前生活的钟南山。

钟南山家庭照
（钟南山为后排右一）

75 岁时，钟世藩先生在患有严重眼疾的情况下，捂着一只眼睛完成了 40 万字的著作《儿科疾病鉴别诊断》。他说：“一个人呐，要是在世界上留下点东西，他就算没有白活。”这对钟南山而言，无疑也是一种鞭策。年龄不是阻力，人生的追求不应被年龄限制。如此，尽管已是 80 岁高龄，钟南山仍毅然赶往抗疫一线。这种挺身而出的勇气，是父辈的感染，亦是自我的追求。

“我们钟家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要永远有执着的追求，第二个办事要严谨要实在。”话短情深，这是祖辈对后辈的期望，更是后辈对祖辈的继承。家风的传承是一个相互的过程，祖辈对晚辈淳淳教导、言传身教；晚辈对祖辈满怀敬意、自觉效仿；而家庭教育如同一架桥梁，架构起两端，实现这种传承。

人生之路虽站点无数，可家庭是第一站；人生之师虽各具千秋，但父母是第一任；家庭、父母、子女，构成家风传承的关键。

时代变化更替，岁月前行不止。多少次烽火狼烟，多少场妻离子散，可是物质的瓦解阻断不了精神的延续，只要一人尚在，家风永扬。它会如一泓清泉，淌过碎石嶙峋，冲出拦路障碍，漫于无边原野，终始向前。

“一个家族的传承，就像是一件上好的古董。它历经许多人的呵护与打磨，在漫长岁月中悄无声息地积淀，慢慢地，这传承也如同古玩一样，会裹着一层幽邃圆熟的包浆，沉静温润，散发着古老的气息。”作家马伯庸如是感慨道。传承家风就如同打磨古董，它历经时代的积淀和充盈，在每一个时代都发挥着它的作用。

家风的传承不限于一家一户，而是一个民族的传承。每个家族优良家风的内核都有相似之处，而这相似之处的出处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在每个家族的具象化。现代社会发展迅猛、日新月异，先辈们的一些家训和家风或许已无法完全适用于今日的社会，但其中一些亘古不变的精神内核仍然是后人留存和延续的宝藏。

以家风育家庭，于家庭传家风，留存千年传承的浩荡风气。

撰稿 / 本报记者 顾悦然

理想秩序与现实实现之差？
——宋代社会的“女内男外”

由古至今，“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观念长久存在。究其来源，大致是起于《周易 · 家人》卦：“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这段彖辞的内容不仅是个人家庭内部的男女分工，且同时将个人家庭的秩序推广向社会。这种观念界定了家庭内部男女的活动空间，同时确立了男女在家庭话语权中的对立位置。

“内外”作为一个空间概念，在传统家庭关系的界定中，具有两个内涵：在家庭内部，将男女的具体活动空间划分为“外室”和“内室”，如司马光之“凡为官室，必辨内外”，且强调“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通过“中门”之界将女性框定在内室之中；而在由家庭延伸向社会公共空间时，则区分“男治外事，女治内事”，将与家事相对的、涉及社会公共空间的事物归入外事，使得男性成为社会公共价值观念介入个人家庭的唯一媒介。在这两种内涵中，隐含着家庭内部的尊卑秩序，即受限于内室的女性对参与社会生活的男性起辅助作用。

在女性史中，唐宋时期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初发期。然宋又有“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之言，故宋代女性的地位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同时宋代的政治社会有其特殊性，宋代士大夫拥有高于前后代的政治主动性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他们掌握着社会话语权，自然也承担着为女性安排社会位置的任务。宋代士大夫对“女内男外”的问题多有阐述。他们常依托于春秋以来的观念构建其理想秩序。但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的理想构建不一定等同于当时的社会现实，那么，“女内男外”在宋代的实现情况与士大夫的理想差距有多大呢？

南宋女孝经图

女不言外？女无外事？

《礼记 · 内则》对于男女内外有别提出“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强调女性不应与社会公共事务产生关联或有所接触。司马光的“中门”之说亦从此理，在女性活动空间与社会公共空间之间构建了一层隔离。然而，在宋代士大夫对女性的叙述和评价中，却可以发现一些女言外事、外言入内的不遵循内外规范的例子。如苏轼为其亡妻王氏作墓志铭：“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复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可见王氏不仅可听闻外事、干预外事，品评丈夫社会生活中的人物，并且其行为与建议都受到了其夫的赞赏。又如《崇国夫人符氏墓志铭》记：“给事（其夫张宗雅）居常与士大夫议论，夫人多窃听之，退而品第其人物贤否，无不曲当。”王氏与符氏这样听闻外事于屏窗之间的例子在宋代不为少数，并且为士大夫所记载和肯定。从这些特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宋代士大夫理想中女性与社会事务的隔离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有一部分与男性建立家庭联系的女性，实际上可以通过男性与社会事务的联系，间接或直接地对外事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内外沟通”的现象是为制订内外规范的士大夫所默许的。

比于苏轼等人之宽松，司马光对于“女内男外”则要求严格，他认为“女无外事，有善不出闺门”而不为亡妻作墓志铭。然而所谓“女无外事”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真的得到实现了吗？在宋代士大夫撰写的女性墓志铭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到一些行外事于规范之外的例子。陆佃所撰《蒋氏夫人墓志铭》有记：“熙宁岁在单于，勾吴大饥，夫人令子为食于路，与里之饥者，又墟其地以掩暴骼数千百人，君子闻之，不多其子，而多其母也。”谢逸在《江夫人墓志铭》中写道：“岁饥且疫，僵尸横道。皆犬彘之馁馀也，夫人闻之，恻然出奁中今瘗之，平生乐赈人之穷，宗族乡党之间受其赐者不知其几人矣。”蒋氏与江氏的作为皆是女性参与到社会公共活动中的例子。且宋代妇女参与社会救济活动的不在少数，可见“女无外事”大有例外。

尽管以上诸多例子都局限于社会上层女性，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宋代士大夫理想中的“女不言外”“女无外事”的秩序与现实实现之间存在一个灵活变动的空间。在“女内男外”的格局下，一些逾越男女内外之别的例外是为士大夫群体所接受的。

“女内男外”与“内外沟通”冲突吗？

宋代士大夫在掌握社会话语权的条件下，为什么采取一定的宽松态度来对待自己推崇的男女内外规范、允许女性一定程度地越过内外之别呢？士大夫放任其理想秩序与社会现实实现之间存在一定落差，实质上还是因为“女内男外”与“内外沟通”之间并不冲突。

回到最初的《周易 · 家人》卦，宋代士大夫在其中最关注的或许并不是“内外之别”，而是“正位”。《家人》卦强调“正家而天下定矣”，宋儒朱熹亦言“内正则外无不正矣”。士大夫区分男女空间位置、社会位置的出发点在于实现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位内部的“正位”，而“正位”向外延伸到整个社会，则成为“秩序”。宋代士大夫对社会秩序的系统构建格外关切，而这种关切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其对前代失序的畏惧和反思。有如欧阳修言：“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而以男女关系为人伦秩序之基础，亦有其思想传统，如《周易 · 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因此，为男女关系“正位”成为宋代士大夫重建秩序的第一步。君与臣、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妇，皆是相对存在的事物，要在其中理顺关系、构建秩序，则需要各自有一固定安放的位置和区别彼此的界限。因此，“女内男外”的真正目的在于为男女安排固定的活动空间并保持男女尊卑有别，而非形成对立、隔离的关系。从男女推及其他社会关系亦是如此。由此，宋代建立起一套以男女正位为基础、上下贯通、层层推进的社会秩序，这是士大夫应对社会流动、维护稳定的举措。在这一套人伦秩序中，尊尊亲亲的传统礼制得到严密贯彻，每一个社会角色都被赋予了固定的位置、被圈定了各异的活动空间，无人不在规范之下。故在宋代社会，“女内男外”这一规范的道德价值远高于其作为家庭分工标准的价值，成为了防止“礼崩乐坏”的道德基石。

从正位女性之于家到构建秩序之于天下，相信“将成其国，必正其家”的士大夫始终是这一链条的推动者。在父权话语体系下，女性很难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声音。宋代女性的社会位置、价值评判，很大程度上是依照士大夫的思想逻辑进行的。因此，宋代女性的地位问题并非一个独立问题，而是宋代社会秩序演变中的一环。基于此，研究女性史应当要在士大夫话语体系下看古代妇女问题、在人伦秩序网络中看古代女性地位。

撰稿 / 本报记者 林新曙
（图片均来自互联网）

集句诗的前世今生

如果你在过去应考的十二年中曾有背串古诗的经历，歌曲《自挂东南枝》在唤醒你熟悉的记忆时恐怕也会让你产生共鸣。

2009 年，一首名为《自挂东南枝》的网络歌曲悄然发布。受网络歌手的知名度限制，这首歌在当时的传唱度并不高。《自挂东南枝》的真正走红始于 2013 年，洛天依及多位网络歌手的翻唱使得听众群体不断扩大。同年，《十万个冷笑话》动画播出，片中引用了《自挂东南枝》中的部分歌词。随后，2014 年上映的《十万个冷笑话》电影片尾曲更是将这段引用的文字直接写入了歌词。电影的高知名度和周杰伦作曲的噱头，成功将原版《自挂东南枝》推入了大众视野。迄今为止，仅 b 站一个平台，洛天依翻唱版本和原版衍生创作视频的播放量总和就已逾百万。

《自挂东南枝》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歌词——由 89 首古诗词中的语句重新排列组合而成。尽管歌词每一联诗的上下句分别摘自不同的诗词作品，但在串词者临池的笔下，歌词朗朗上口，宛如一联。音韵和谐使得《自挂东南枝》的可听性极强，换句话讲就是"洗脑"。无怪乎网友在爆笑的同时留下了"**语文考试之前不要听！**"的评论。前后句的歌词宛如出自同一首诗，确实容易使得考生的记忆出现偏差：从歌词的内涵来看，"**病中垂死惊坐起，笑问客从何处来**"，"**仰天大笑出门去，无人知是荔枝来**"之类的调笑之句占到大多数，上下两句往往毫无关联，却能在迥异的语境中重构出另一种荒诞的逻辑，在一本正经的外壳下令人忍俊不禁。此外，也不乏"**桃之夭夭，且向花间留万照**"，"**长亭外，古道边，一行白鹭上青天**"等语境相对和谐的混搭诗句。即使记得原句，读起来也会有恍惚之感。

其实，将前人的诗句重新排列组合之举并非今人的原创。古人专有"集句诗"一词用以指称将他人的诗句"拼盘"而成的诗作。明代徐师曾将其定义为："**杂集古今以成诗也。**"它或汇集古代一家之诗，或荟萃古代数家之诗而创作成一首新的诗，犹如一件"百衲衣"。集句成诗的源头可追溯至晋代

"自挂东南枝"的原始出处

傅咸的《七经诗》，现有五首传世，其中《毛诗诗》一首直接从《诗经》中摘取诗句成诗，未加改动。其余四首虽然也都是以经学著作为依托，但都对引用的语句加以改造，重新组合为四言诗的形式。这说明傅咸尚且没有后世"集句"的概念。但正如《南齐书 · 文学传论》评论所言："**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傅咸《七经诗》体现了后世集句诗的核心思想："**断章取义**"。即对诗句意义的拆分、重构和化用。如比如曹操所作的《短歌行》，诗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句也取自《诗经 · 子衿》。原诗中是女子在思念中描摹爱人的身影，曹操则以此句表达对人才的渴慕。后一句"**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是"**悠悠我心**"的表现。

尽管集句诗魏晋时已经出现，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作为一种游戏文体存在。换句话讲，文人们仅以此玩笑，并不把集句诗当作一种严肃的文学创作。因此集句诗在唐代甚少见录于诗人文集，直至宋朝才真正迎来发展的高峰。集句诗的曲折发展，原因其实很多。一方面，集句诗虽然被视为一种文字游戏，但集句诗在形式和内容上仍符合传统诗歌规范，受到一般诗歌理论的指导和约束，其中出色者完全可以取得不逊于寻常诗词的艺术审美效果。故而宋人虽称之为"戏"，却不视之为"俗"，盖因此体"出身"高贵：用作"游戏"的是语言文字，而作之者多名人雅士，到底与通俗文学异趣。另一方面，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诗歌创作最为繁盛的时期，其辉煌成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宋朝诗歌创作走到了"**穷则思变**"的地步。再加上唐朝留下了汗牛充栋的优秀诗歌，为集句诗提供了大量素材，集句成诗这一另辟蹊径的创作方式自然成为宋朝文人的尝试方向之一。

宋朝集句诗的发展始于石延年。石延年，字曼卿，以豪放不羁、诗风劲健闻名于当世。他创作集句诗时更多地抱有一种"**以文为戏**"的态度，如自嘲屡试不第的《下第偶成》："**年去年来来去忙，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门去，独对春风舞一场。**""石曼卿在诗坛的地位使得集句诗风行一时，但真正创作大量优秀集句作品，奠定集句诗在文坛正式地位的当数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七十九收集句诗 43 首，其中绝句 21 首；加上卷八十所收的一组集句七言古诗《胡笳十八拍》，总共 61 首之多。后人对其集句诗也多有好评。周紫芝说："**集句近世往往有之，唯王荆公得此三昧**"（《颐山诗话》，四库全书本）；胡仔说："**荆公集句诗虽累数十韵，皆顷刻而就，词意相属，如出诸己，他人极力效之，终不及也**"（《攻媿集》卷七十五《跋郭适之集句梅雪诗》，四库全书本）。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模仿蔡琰口气所作的《胡笳十八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苏、黄大加抨击，却对王安石的集句诗赞不绝口："**集句惟荆公最长，《胡笳十八拍》浑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沧浪诗话》校释本）可见王安石集句诗艺之高。王安石对集句诗的贡献有二：一是拓宽了集句诗的创作题材，使集句诗在题材上走向了严肃，囊括怀人、送别、咏史、怀古、记事、咏物、写景等诸多题材而不止于调笑；二是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甚至使得后人在品评他诗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博闻强识**"、"**如出一手**"、"**声律和谐**"等评判集句诗优劣的标准。南宋时，出现了葛次仲和林震二位以创作集句诗成名、在集句诗中又以律诗见长的诗人，使得集句诗有了"**意贯而对偶**"的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天祥的集杜诗。在抗元失败被俘后，他在狱中作《集杜诗集》一卷共 200 首，以抒发守土报国之志。《集杜诗集》也成为了集句诗专题化的代表作。

宋代以后，集句诗仍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势头，创作规模越来越大。至清朝时，已有文人集句诗作达数千首。明清时，

王安石：为集句诗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集句诗逐渐成为传奇、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中共出现集唐诗 69 首，数量可观且艺术价值显著。

集句诗的故事到此暂时告一段落，当代集句诗的创作重新回归小众，取而代之的是"**抱歉，我古诗背串了**"的大言不惭。《自挂东南枝》并非只是串词者一时奇思妙想迸发，而是在古诗背串、应试压力与娱乐心态下的有意收集和构建。以《自挂东南枝》的歌词体量，其所体现的诗句乱搭的现象不过是沧海一粟，更多的"奇句"还在学生的口耳相传之间。

何况《自挂东南枝》已是十年前的歌曲，乱搭诗句这一行为在一代代学生中推陈出新，恐怕串词者临池都未必能想到今天乱搭诗句已经发展出"**忽如一夜春风来，ρ 液等于 gV 排**"，"**巴山楚水凄凉地，responsibility**"之类诗句与物理公式、英语单词的搭配，完全跳脱出了诗句的范畴。这一现象也开始出现在视频领域，而 b 站流行的"鬼畜"视频成为其主要载体。这类视频一般以"**xx 教你背古诗**"为视频标题，视频形式则大同小异。一般由智能语音助手念出一联七言古诗的上半句，下半句则为视频主角 xx 所说的尾音押韵的七个字剪辑而成，配以节奏感极强的背景音乐。这类视频娱乐性和可听性都非常高，继鬼畜区 up 主之后，也有粉丝开始为自己喜爱的明星剪辑相关的"集句"视频。

如果我们将集句诗与当代"集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可以发现，现代"集句"又回到了集句诗最初"游戏文体"的位置上。当代"集句"以娱乐性为重，甚至唯一与古代集句诗相关的"**音韵和谐**"也只是为了听众的感官愉悦而存在。除此之外，很多集句诗所集非句，所成非诗，上下句只有韵脚相同，而内容却毫不相关或逻辑奇诡，以求拼凑的效果足以荒谬到引人发笑。曾经"**如出一手**"的艺术标准早已不再被"集句"创作者追求了。

集句诗作为一种正式文体虽然式微，但仍在当代诗词爱好者的坚持下缓慢发展。网络上很容易找到一些当代的集句诗作，如这首作者姓名不详的《**集唐诗宋词咏中秋**》："**白日依山尽，孤云独去闲。万象为宾客，千里共婵娟。**"对仗工整，别有意趣。即使在《自挂东南枝》中，也有"**花落知多少，今日少年明日老**"这样别具韵味的句子。上句出自唐代孟浩然《春晓》，抒发诗人对春光易逝的淡淡惆怅，下句出自元代陈草庵《山坡羊 · 晨鸡初叫》，是词人对屡试不第者被名利裹挟、无法抽身的叹息。上下两句相和，竟流露出"**韶华不为少年留**"的第三种哀婉情绪，即使以古人的标准来看也颇有可取之处。从这个角度来说，集句诗与当代生活的距离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遥远。作者与读者的心境本就不可能时时共通，而"**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才是寻常事。正如有人以"**我未成名君未嫁，卿须怜我我怜卿**"作热恋时的情语。这样的集句将两句原诗中的忧伤寂寥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爱情的坚定与热烈。的确，读诗需要理解诗人心境才能体会诗句的绝妙。但优秀诗作高度凝练的字句、独特的情感表达也更容易使读者基于自身心境生发感悟和理解。心事总有说不尽时，集句不失为当代人以古诗"代言"心事的一个好方法。

撰稿 / 本报记者 杨元雅

楚帛书：固已飘零久，芳华千秋存

引

"**50 年前，长沙镖子岭。四个土夫子正蹲在一个土丘上，所有人都不说话，直勾勾地盯着地上那把洛阳铲。……**"这是小说《盗墓笔记》的开场——在这之后，一段盗墓传奇徐徐开启。而引起整个故事的楔子，便是开篇这四个土夫子盗出的一部战国帛书，它在其后的情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小说中的战国帛书，据说是有现实原型的。

一 惊鸿初见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

人群熙攘、琳琅满目间，我被一个展品，不，确切地说，是一块展板，深深吸引了。"**楚帛书 战国 · 楚 1942 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 现存美国赛克勒美术馆 帛书文字为墨书……**"我久久伫立，一阵心酸淌过，又是一件流失海外的文物啊。同时，一种宿命感深深攫住了我：这不会就是小说中战国帛书的原型吧？难道它的流失也如小说所述那般传奇迷离而令人叹惋吗？凝望中，帛书上古朴灵动的字画，仿佛也携着经年的风霜，一笔一划刻入心间。

国博"回归之路"展览海报

二 风霜远客

1942 年 9 月，70 多年前，长沙城郊子弹库。

任全生、漆孝忠、李光远、胡德兴四个"土夫子"打开了一座战国古墓。这不是一座寻常的墓，他们不仅在这里见到了"鬼火"，更在其中收获了一批铜兵器、漆器、木人及一些残碎的纺织品等。他们将这些文物卖给了收购文物的"唐茂盛"古玩店老板唐鉴泉，并随手将一块墓中所得的"破布"送给了唐鉴泉。殊不知，这块并不起眼的"破布"竟是后来名动天下的楚帛书。楚帛书的经年飘零之旅，也自此开始。

解放后，当年的四人都成了湖南考古所的工作人员，为我国考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楚帛书等文物的流失成为他们心中长久的痛。受当时交易双方的文化程度所限，楚帛书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认识。所以在出土、交易及后续保存的过程中，楚帛书遭到了严重损坏。据当时托友人在古玩店观察过楚帛书的商承祚先生言，"**（楚帛书当时）是在白纸之外再用报纸将之松松卷起，大块的不多，小块的累累，将来拼复原样恐怕不可能**"（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帛书难以复原，也是商承祚先生当时未及时购买帛书的主要原因。后来，著名的古董商人蔡季襄捷足先登，购得楚帛书。他对帛书进行了一定修复，并开始研究帛书。时值日本侵华在战争期间，日军进犯长沙，蔡季襄一家在逃难途中历尽波折，他的妻子和女儿更是被日本人威逼致死。悲愤之下，蔡季襄沉心研究帛书，在战火烽烟中尽力守护国宝，并于 1944 年写就《晚周缯书考证》一书，这是第一本楚帛书的研究著作，在当时文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为了进一步研究帛书，蔡季襄希望借助红外线技术照出部分文字，因当时中国缺乏这样的技术，他便前往上海寻求外国人的帮助。然而，帛书却被美国人柯强以拍摄清晰照片为由骗去——柯强名为考古学者，实为美国情报人员，趁战乱掠夺了大量中国文物。柯强当晚便将帛书运往美国，并强行以交易方式从蔡季襄手中"买"走了楚帛书，而蔡季襄此后多次与柯强交涉都未成功，楚帛书从此流落海外。

楚帛书到达美国后，又多次辗转，最终为塞克勒医生购得，至今仍收藏在美国塞克勒美术馆中，并成为其"镇馆之

楚帛书图片

宝"。塞克勒医生在去世前曾一度表示要将楚帛书交还中国，却因种种原因而未实现，楚帛书也一次次与祖国失之交臂，直到塞克勒医生去世也未能成功回家，成为中国的长久之殇，令无数人扼腕叹息。

这段故事至今读来仍令人悲痛不已。但祸福相依，也正因这段长期辗转的传奇经历，楚帛书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高

（下接第七版）

艺术中的鱼水情深

在老一辈的戏班里，当江湖艺人还处于“跟班走穴”的阶段时，师父们就会教给徒弟们一个道理：“戏台上只要一开嗓，就一定要唱完。凡人不听，不代表鬼神不听。”表演者心中一定要装着观众。台下功夫数十年，只为台上的一举一动能够给予欣赏者最精致的艺术呈现；而观众只要坐在台下，就将与表演者共处同一艺术境界，共同感知艺术。从古至今，舞台表演永远是一门相互的艺术，表演者有受众，观众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艺术的表现，这便是艺术中的“鱼水情深”。表演者和观众共同扛起了艺术大旗，创造和传承艺术的重任，也理应由此二者共同承担在肩。

将观众也拍进镜头里

舞台似乎是公认的最光鲜亮丽的地方。镁光灯下，众人瞩目，高潮迭起，仿佛所有的美和热情都来自于演员和舞台。而或许在演员看来，事实并非如此。对于演员来说，观众的反映决定着表演的水平、表演的热情，甚至其每一个表演环节都与观众息息相关。

在中国传统的舞台表演艺术中，演员和观众的“鱼水情深”似乎格外突出。在古代中国，“舞台表演”是一种十分“亲民”的表演形式，这是因为艺人大多将表演地点设在街边，靠路人打赏；余下小部分在戏楼中唱戏的，虽说有表演的高台，但台面小，亦没有护栏，演员与观众总是十分亲近的。卖艺表演中，演员与观众之间偶尔逗个闷子，散场之后甚至能成为友人，建立起一种十分轻松的关系。演员们认为，表演的顺利进行与观众的配合脱不开关系，有时表演甚至需要观众来推动。

被观众簇拥的街头艺人

我国古代有一种民间艺术，叫做“古彩戏法”。古彩戏法在南宋就已出现，表演范围跨越我国大江南北，一直深受大众喜爱。古彩戏法通俗来说就是中国的“魔术”，这种民间艺术是台上台下互动的典型代表，询问观众有无疑惑、邀请观众上台当场验证真假等环节常常出现。按照表演安排，演员上台之前会穿上宽松的大褂，在身上紧紧绑上许多复杂的道具，上台需要步履轻盈，节目开始时偶尔还需要撸起袖口，给观众展示一下袖内并无机关。节目的进行也是时时需要观众参与的，例如，常见的戏法节目“鸳鸯棒”就是由演员和观众共同完成的。道具“鸳鸯棒”是一种联动工具，拉动一根绳子，另一根也会随之走动，但表面来看二者并无联系。在表演时，演员需点出一位观众上台，通常要求观众“向绳子吹口气”，或是“挠挠耳朵”，此时绳子发生移动，就达到了表演效果。观众的疑惑不解推动着表演进入一个又一个高潮。

观众的每一个反应都与舞台艺术的最终呈现密切相关。因此，许多演员都会将观众视为“参与者”，他们要求“将观众也拍进镜头里”，要求在表演时与观众建立一种亲近的、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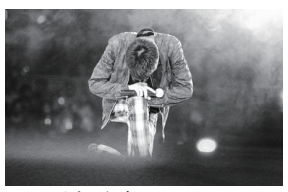
所谓“衣食父母”

事实上演员与观众的“鱼水情深”不仅体现在艺术呈现上。演员对于观众拥有一种天然的依赖感，一是因为演员的收入取自观众的口袋，而观众给予演员的支持与配合更是让演员深深地体会到一种“艺术中的恩情”。

当被问道“观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的时候，相声演员白金硕说：“我现在更愿意把观众当搭档，是一种相互成就的感觉。观众的数量、反应、掌声、笑声是我继续说相声的动力，我也把笑声送给观众。这种关系是平等的、交互的。有时候我上场如果不戴眼镜，那对于观众反馈的收获就大打折扣。总感觉有一种失落感，或者说叫‘不爽’。我永远热爱舞台、敬畏观众，尊重与珍惜是始终不变的。但是我感觉一场节目的完整度是与观众的代入感与反馈分不开的，氛围是由演员与观众共同营造的。这种氛围越好，演员与观众的体验就越好，收获就越大。”

在艺术中，共同呈现和合作艺术的人，一定会有一种心与心的沟通。演员在舞台上有着“看清观众”的需求，哪怕是对上一个眼神，也会立刻心领神会。中国传统艺人有句老话一直流传到现代，叫做“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舞台上的艺术呈现把握在演员手里，而演员的举动和情感渲染力，实际把握在观众手里。由古到今，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什么形式的舞台艺术，演员对于观众的感恩和回馈也一直为大众称颂。

歌手张敬轩在每次红馆演唱会结束时，都要单膝跪谢四面台；香港巨星张国荣，在飞机上遇到害羞的歌迷，会上去主动给她签名……光彩夺目的演员，总是愿意怀抱着感恩之心，用特别的方式去回馈观众，久而久之，演员与观众的距离也就亲近起来。



张敬轩跪谢粉丝

偶像崇拜和过度的控制欲望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复杂的，群体与群体之间亦然。随着演员与观众距离的不断拉近，观众过度的热情也会给演员带来一些困扰。单从艺术方面来讲，观众的过度介入，对于艺术的呈现实则不利。无论如何热情，在艺术方面，观众的专业性远不及演员。术业有专攻，如果观众想要控制艺术，很容易适得其反，对艺术造成损害。

在西安的大唐不夜城，观众过度介入艺术的现象就频频出现。一位演员身着古代战袍，站在小石山中手握小锤，表演“雕凿自己”，整个过程演员需要凝神静气、动作缓慢，就好像一个“石头人”。然而自从“石头人”走红之后，一大批观众不远万里来到不夜城，打卡网红景点，用尽各种方法试图逗笑演员，有时甚至会对道具拳打脚踢。虽说可以产生一些乐趣，但这种行为确确实实破坏了“石头人”本身的艺术性，而演员对观众的妥协，也很难说保持住了一门艺术的初心。

当演员将艺术妥协给了观众，那么“艺术”还是最初的“艺术”吗？如果艺人没有了坚守精神，一味取悦观众，那么舞台艺术和街头杂耍又有何分别呢？近些年来，相声行业一再受此困扰。以往只有同行对头才会做的“刨活”行为，当今却在观众中频频出现许多演员都表示，由于观众的随意搅乱，演出节奏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甚至出现了演出无法进行的情况。同样地，在一些现代舞台表演艺术中也时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音乐会上，观众不合时宜的掌声影响乐团的演奏；音乐剧中，演员需要在返场环节多次安抚观众，无法安心表演……

距离产生美

针对混乱的演出状态，相声演员郑佳明讲到他对观众的观点，“我个人比较反对的是把观众和顾客划等号，一味地去迎合观众，以至于放弃艺术本身应当固守的底线，这样只会让这门艺术的生命力在外行人的吆喝声中逐渐丧失掉，有名无实。”演员对于艺术的处理常常需要在独立状态中进行。从艺术的专业性方面来谈，演员没有必要过于贴近观众；有时候，演员保持对艺术的坚守才是正确的道路，有距离才能产生美。

演员和观众本是两个陌生的群体。他们因为艺术相聚，因为艺术产生灵魂交流，又在共同享受艺术的过程中促成了一种新艺术的萌芽。这种和谐美好的关系，是需要二者共同维护的：演员不要吝啬自己的热情，要多站在观众的视角衡量表演效果的好与坏；而观众也不应过分介入，要适当与舞台保持一段距离，更多地用欣赏的态度对待艺术。

舞台艺术是当今十分普遍的艺术形式，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快节奏社会，欣赏舞台表演成为缓解压力、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对于艺术，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都应保有“责任”意识。共同努力，艺术才能够平稳发展。演员与观众的相处成就艺术中的“鱼水情深”，而这种“鱼水情深”也使得艺术世界更加斑斓。

撰稿 / 本报记者 闫芳铭

（上接第六版）

度关注。曾宪通先生曾说：“几乎没有一件中国文物像它这样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对它的研究历久不衰。”

楚帛书是目前出土最早的古代帛书，也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术数文献，对研究战国时期的楚文字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有重要价值。在楚帛书中，我们能看到楚地文字、文学和绘画的浪漫主义精神，楚人将自然赋以神灵之形与性，各具特色、天真而浪漫；也能看到熠熠生辉的楚之精神，那坚韧不屈、不忘忧患、穷究天道的可贵品性，至今熔铸在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楚帛书不仅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珍品，也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这样可爱而可贵的文物，怎能不扣动人们的心弦？

三 沉吟至今

文载于物，族髓附间。运脉牵连，兴者襄见。文物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楚帛书的飘零辗转，正是对旧中国落后、屈辱历史的折射。若非技术落后，怎会难以研究文物、以至外求于他国？若非国力衰微，怎会有大量文物被掠夺、破坏而无能为力？在动荡不安、积贫积弱的时代，人的安危尚且难顾，何况脆弱的文物？即便有心保护、研究文物，也难以实现。

我国流落在外的文物远不止楚帛书一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在积极推进文物回归工作，制定、完善了相关法律法规及文物保护机制，严厉打击文物走私，并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物保护公约，与世界各国、海内外华人华侨等携手搜寻海外遗珍。这些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让众多飘零海外的国宝文物重返故土——六尊圆明园兽首铜像、伯远帖卷、五牛图卷、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等都是代表性的“回家”的宝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也于 2019 年 9 月至 11 月举办了“回归之路”主题展，展示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量流失文物回归成果。我们与它们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的充分展现，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的体现。

正如展览结语所言：“一段文物流失史，经百年愤怒、无奈、悲凉的熔铸，已经融入中华儿女情感基因，激励国人时时警醒，砥砺前行。一条文物归来路，70 年筚路蓝缕，路转峰回，每一次回归，都在凝聚着民心，激昂着力量，重重擂响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鼓点。”楚帛书等文物是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见证，更是我们创造美好未来必不可少的无价之宝。楚帛书的千年传奇，也必将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进程继续传颂。

撰稿 / 本报记者 樊柯佚

“九”字诗

九在中华文化中向来有着诸多美好的含义——“疑是银河落九天”是天地的高远与广阔；“思九州之博大兮”是古人对家国的理解与认同；“乾元用九天下治”是先贤对心想事成的向往；“九重城阙烟尘生”是重重殿宇的恢弘与壮丽；“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是九在美好节日中的顷身回眸；“小语轻怜花总见，争得似花长久”是所有人对长久美满的期望……九在天地间，传说中，殿宇里，更在所有人或苦或甜的生活中，在充满匆促或静好景色的流转的光阴里。在人文报出版第九十九期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谨以《“九”字诗》相赠，祝愿春秋人文报能够越办越好，也祝愿所有师大学子万事胜意，长长久久地喜乐安康。

九重天上冰月清，九泉之下烛火明。
碧落黄泉何处寻，只余月辉染薄云。

禹铸九鼎象九州，黄河九曲万古流。
华夏九族齐聚首，豪言共话谱春秋。
龙生九子各千秋，鹿有九色立山头。
狐卷九尾月上走，凤昂九首鸣清秋。

阴阳轮转九为阳，熠熠生辉其道光。
九九归一路漫长，终成正果菩提芳。

殿宇重重气恢宏，九丈九尺九环铜。
九五至尊履从容，九卿执笏阶下恭。
九华龙袍万世崇，九彩龙壁沐清风。

冬至阳生雪皑皑，九九踏歌盼春来。
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望烟柳。

故宫屋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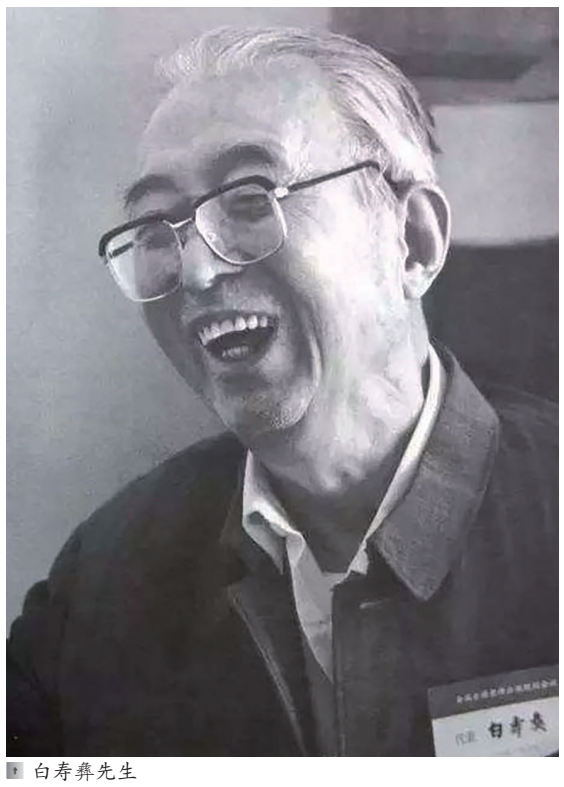
九九已毕春方归，绿杨烟里莺燕飞。
九月初九至重阳，独上翠微倍思乡。
惟愿双亲福寿长，不辞长举菊酒觞。

陌上年少是风流，长身玉立低眼眸。
杏花疏影笛清幽，佳人望月未谙愁。
元夜人约黄昏后，明月皎皎灯依旧。
繁华灯影蓦回首，执子之手共白头。
莫负天真与温柔，岁月长久共相守。

帝王殿中寻常见，瑰丽传说几度闻。
九自远古传金声，飘融人间万盏灯。
但愿天下人长久，千里喜乐共婵娟！

撰稿 / 本报记者 罗乔音
（图片均来自互联网）

白寿彝：学海探珠，誓不罢休


白寿彝先生

望着历史学院墙上那炽火颜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恍惚中好似瞧见了白先生在昏黄灯火下激扬文字，在讲台上挥斥方遒。从英东学术会堂走过，好像看到了白先生长舒一口气，展露出慈祥的笑容……

白寿彝先生的学术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交通史、史学理论和历史教育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是当代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悠悠，白驹过隙，先生离开我们已有 20 周年。值此之际，让我们回溯历史，缅怀大师。

少年意气非一时气扬

1929 年 9 月，戴着厚片眼镜、瘦瘦高高的白寿彝踏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他操着浓重的开封口音对导师黄子通说：“我想用两三年的时间写出一本超过前人的哲学史。”导师认为他说大话，批评他“趾不高而气甚扬”，道：“你要想研究学问，是要吃苦头。要不想研究学问，现在还来得及，你可以离开学校。”于是他潜下心来埋头苦读，积累学识。1936 年年仅 28 岁的白寿彝先生受顾颉刚先生之邀，开始撰写《中国交通史》。这本完成速度极快，内容准确详实的书令史学前辈们大吃一惊。

白先生少年时便树立鸿鹄远志，在开封圣安得烈学校读书时，校长问他为什么要学习英语，他回答说道：“我要了解世界。”1928 年正值整理国故和全盘西化的争论活跃时期，19 岁的白先生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一文。他在文章中主张中西并取，用其所长。随着这篇学术论文的发表，先生的学术研究事业就此开始。

少年意气并非仅体现在先生的才学，更体现在满腔忧国情怀。在《中国交通史》这本书中，洋溢着白先生的爱国热情和理性思考，在第六章“中国交通事业之前途”中，先生犀利地指出中国交通事业关系国家兴亡，需要政府和人民全力以赴。“我们的一部中国交通史，究竟是一部失败史或是一部胜利史，在最近的数年中就要决定。”

白先生知道，他此时手中握着的，不再是一根笔，而是一杆枪。他要鸣枪，震醒国人。他要扣动扳机，扫除一切障碍，为中国指出一条明路。“这个时代已不是再容我们悠游岁月的时候了”。

于清苦岁月中傲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硝烟涌起，先生不愿过亡国奴的生活，便辗转到广西、云南、重庆等地任教。人人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先生这一时期不仅专志于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而且始终关注着民族的命运，为国家做着切实的贡献。

白先生在做学问

边疆地理研究在抗战时期的意义非比寻常，边疆学会宣言中有着“中国边疆仅为国境之界线，非复半壁之山河”的宏愿。1934 年，顾颉刚等先生筹组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时，白先生就是“当时学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之一。避居西南时，白寿彝先生对元、明、清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地区穆斯林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为西南边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即使在战争岁月也没有消极避世、放弃学术，而是将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与自身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展露了白先生强烈的家国情怀。

后来遭遇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波，白先生经历过游行批判，蹲过牛棚；也在荒谬的“考教授”风波中拂袖而去，在批林批孔时对秦始皇和法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先生虽受到了迫害，但这些并没有打败他，仍坚持学术原则和真理，保持淡然与通透。

1971 年周总理为保护知识分子，委托顾颉刚先生，在已完成“前四史”点校工作的基础上继续点校“二十四史”，白先生协助顾先生主持这项工作。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最高成就在不安的文革中悄然展开，1973 年底点校工作全部完成。

外界的漩涡再强，也扰不乱先生的心智。白寿彝先生的女儿白滇生在《我的父亲》中回忆：“在父亲宣布‘被解放’的傍晚，在从后海回家的路上，父亲说得很多，大意是一条顽强的生命需要有一个坚固的支撑架，而这个支撑架大多是苦难、辛酸、孤独、失落，甚至是空虚和羞辱组合而成的。……我想，这大概就是父亲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着坚韧、理智和冷静的缘由吧。”

任其是战乱四起，还是政治纷争，白先生始终屹立在风暴中心，安然，无畏，不退却，不低头，不停笔，不罢休。侯外庐先生曾评价：“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白先生独立自得的精神是当之无愧的。”

大师与师大

1949 年，白先生作为南京教育界代表来到北京，随后又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开国大典。从这时起，白先生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与师大结缘，后又兼任系主任 30 余年，对北师大历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61 年高教部文科教材会议决定把编写高等学校中国史学史教本的任务交给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华东师大，由白寿彝先生和吴泽先生承担。经过几年的工作这部教材的上册印发，起初只作为内部刊物。“印数不多，但散布的范围还相当宽，其中有些论点为人所采用，有的论点还为人所曲解。”先生在 1999 年的《中国史学史教本》的题记中委婉调侃道。

改革开放后，白先生担任北师大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务委员会顾问、历史系教授、《史学史研究》主编等职，创建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所和古籍研究所。而对历史学院影响最深远的，便是先生倡导的历史课程体系改革。

课程改革前，历史系的

白先生和学生们交谈

课程计划基本上还是 50 年代初在苏联专家协助下，按照苏联高等师范教育的模式制定的。专业课主要是中国史和世界史两门通史，又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部分，即习惯上所说的“两条线八大块”，较为死板。1979 年，在白先生的倡议下，历史系进行了第二次课程体系的改革，提出在原有系统教学计划之外，增设选修课，提倡在全校各系设立现代科学概论的课程，提倡中外历史比较。以白寿彝先生首创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课程体制改革成果影响延续至今，达到了“以学术带动教学，以教学促进学术”的目的，丰富了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教师的讲授能力和水平，给历史系带来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课程改革本身。

1983 年，74 岁白先生在史学概论精修班上讲了一个小时，这是先生最后一次公开讲课。课上，先生讲了这样一段话：“思想上不能安于小成，安于小成就一事无成。……但总要求知道的多一点，深一点，千万不要固步自封。”白先生的话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学术上的指导，还有人生的思考。

白先生犹如一片茶叶，落入北京师范大学这一潭水中。无论时间再过多久，这里都存有先生的风骨，留有余香。

老骥伏枥，壮心未已

已近耄耋之年的先生仍不肯罢休，踏上了又一征程。解放前几十年，先生在为糊口奔波，解放后几十年，又在忙于各种活动，“我七十岁才开始做学问”一言是自谦也是心声。

谈到这句话，白先生的学生瞿林东先生感叹不已：“把 70 岁以前的学术积累看作是学术创新的起点，而起点愈高，其创新之意也愈显。白先生的学术生涯确确实实证明了这一点。”80 年代时，瞿先生向老师提议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年发表的文章汇集起来，编成《学步集》二集。白先生摇摇头微笑着说：“我现在想要做的，不是整理过去的东西，而是要创造新的东西！”

创造新的东西，踏上新的征程。白先生晚年的学术创新工作成就非凡，主持了《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回族人物志》等重大文化工程。

1979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一幢简陋的青砖砌成的校舍内，年届七十的先生主持召开了《中国通史》的第一次编写会议。12 卷 22 册、总字数逾 1400 万的皇皇巨著的编写工作就此正式拉开序幕。

在此之前，白先生曾耗费两三年的时间写就一部中国通史，但效果却不甚满意，“文无特色，题无新意”是先生对自己作品的批评。于是先生折返回来，广纳良师益友，从小通史写起，再着手编写大通史。《中国通史》集中了一代人的智慧，荟萃众多名家和 500 余名学者的研究于统一的体裁体例之中，实现了史书体裁的重大创新，创立了新综合体，多层面地反映了历史。

《中国通史》出版庆祝大会

先生任《中国通史》的主编也并非挂名。从通史的组织工作到撰写题记，书稿的审稿、改稿、通稿、定稿及选图编目工作，都是先生亲自来做。即使到了后期，先生因常年眼病近视达 1800 度不能亲自动笔，仍然让他的助手将书稿一字一句念给他听。在审稿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史料问题上的疑点，先生一定不惮烦的予以核实。即使在四次住院手术和去北戴河疗养的日子里，白先生依旧不放松任何机会孜孜不倦地工作。

二十年磨一剑，在 1999 年 3 月，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的《中国通史》终于全部出版。4 月 26 日，庆祝大会在英东学术会堂隆重举行。大会上，先生笑得畅快。“我虽然 90 岁了，还要和同志们继续奋斗下去；多吸收精神上的氧气，多写点为当代人所爱读的历史书，争取再过上一个 90 岁。”

临终前，先生神智已不大清醒。当他稍清醒时，见到看望他的人，第一句话便问“还要我做些什么工作？”先生怀着使命感，责任感，坚持不懈地去追求，去攀登，直到光辉的顶点和生命的尽头。先生好友臧克家赠诗言：学海探珠六十秋，银丝赚来半满头。黄牛负轭桑榆路，该罢休时不罢休。

春秋九十载，学涯七十年，千古先生应如是。

风拂潭水，仍泛涟漪

2000 年 3 月 21 日，就在完成《中国通史》的次年，先生离开了我们。就好似他的使命已然了结，便潇洒无憾地转身离开。先生踏着春风来，乘着春风去，留下了烂漫春光，留下了皇皇巨著，留下了治学精神，留下了对后生和未来的期待。

“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是留给教育者的；“治史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是留给后生的。

“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在 21 世纪中，若想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那就必须要求研究工作者除了应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坚实的研究基础外，还应有史学家的气魄、器识和胸怀。我深信，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在全体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的史学研究必将打开一个新局面。”“在新世纪里，史学工作者应负起时代的责任，让史学发挥更大的作用，协同各方面的工作，推动历史的前进。”垂危暮年，在北京友谊医院的病榻上，先生写下了《千禧寄语》，写下了《新世纪的展望》，这是先生最终的期待，最后的嘱托。

一年又一年。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当风再次拂过水面，看，一圈圈，仍泛涟漪……

白先生和夫人

撰稿 / 本报记者 潘景怡
（图片均来自于互联网）